



□ 李长庚

陕西又称秦，或者三秦。“三秦”这一称谓最早仅指关中和陕北。楚汉争霸时，刘邦占据汉中，自封为“汉王”，辖陕南及巴蜀之地。项羽为了牵制和防范刘邦扩充势力，将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个降将，故称“三秦”，后世用“三秦”泛指整个陕西，包括了陕北、关中和陕南。

中华民族在沃野千里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水草丰茂的陕南鱼米之乡，谱写了中华文明繁荣兴盛的华美乐章。“秦中自古帝王州”，在北宋经济中心南移之前，陕西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多个朝代在此相继建都。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周、秦、汉、唐都是在三秦大地拉开大幕并抒写了辉煌的历史，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在这里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存和丰富的历史记忆。

三秦文化具有“根源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谓“根源性”是指三秦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许多内容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和源头之所在，整个文化形态，呈现出根深叶茂的特点。所谓“多样性”是指古代陕西是中华文化内部各个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也是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区域。在域外文化输入、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三秦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吸收了各种文化的有益成分，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独特魅力。

根深叶茂的文化底蕴

陕西是人类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秦岭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号称中国的“龙脉”，早在100万年前，秦岭北麓就出现了蓝田猿人，能够直立行走和制造使用石器工具，标志着“人猿相揖别”，中华文明在这里揭开了重要一页。

陕西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距今六千年前，渭河流域就出现了原始的社会部落。半坡氏族开始了种植、畜牧、渔猎的农业生产，开始了日出而作、日未而息的部落聚居生活。西安东郊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的发现，昭示了三秦大地农耕文化的早期萌芽。

陕西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轩辕黄帝归葬之地。黄帝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统一各个部落，建立了国家，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雏形。黄帝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从黄帝时期开始算起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乔山”。自从黄帝葬在陕西乔山，起衣冠冢为陵以后，几千年来，官方和民间的黄帝陵祭祀，绵延不断。《史记·汉武本



三秦文化：根深叶茂 异彩纷呈

纪》记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明代将黄帝陵祭祀列为国家祭典，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代表共同祭祀黄帝，毛泽东亲自撰写《祭黄帝陵文》。黄帝祭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确认的传统，维护民族集体意识的情感纽带。现如今，黄帝陵上古柏参天，郁郁葱葱，枝叶繁茂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万古长青。

陕西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兴盛地。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教化被用来维系国家统治、生活治理和人际关系。“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而周公正是在陕西完成了制礼作乐的历史创举，留下了《周礼》《仪礼》《礼记》等文化经典。《国语》记载，“周之兴也，鸛鷖（即凤凰）鸣于岐山”，周朝是从陕西岐山、扶风等周原一带走向兴盛的。陕西宝鸡有“中国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已经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青铜器，见证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繁荣兴盛。

陕西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定型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以及“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朝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了度量衡和语言文字，创立了“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后来的各个朝代正是在秦代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使国家管理制度日趋完善、成熟和定型，为中华文化延绵不断、薪火相传提供了制度保障。秦人以关陇地区为根据地，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在群雄争锋中胜出，完成了统一大业。此过程中，秦人体现了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变法图强的民族精神。秦朝虽然短暂，但是对中华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兵马俑，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陕西是大汉雄风的振起之地。汉族、汉字、汉语的称呼都与汉文化有关，汉水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刘邦是从经营陕西汉中开始，逐步壮大，建立大汉基业的。长安是西汉的都城，也是学术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为官方意



识形态的主导思想。陕西人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陆上通道，后来，在这条通道上主要贩运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其为“丝绸之路”。陕西人司马迁创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这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为中华文明上古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影响了后来史书的撰述体例。

陕西是盛唐气象的展现之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先后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杜甫的诗歌《忆昔二首》形象描绘了开元时期的社会盛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苦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个历史时期，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和谐，文化昌盛，各类文艺形式，例如诗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争奇斗艳、大放异彩，特别是唐诗的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唐诗描绘了繁花似锦、车水马龙的长安，长安造就了千帆相竞、百舸争流的唐诗。唐诗表现出来的“盛唐气象”充分彰显了大唐的文化自信。

陕西是红色革命文化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坚持英勇抗战的十三年，是领导中国革命从弱到强、逐步走向胜利的十三年，是党自身不断学习、建设发展成熟的十三年。十三年的光辉岁月在陕北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文化的遗迹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延安的红色文化吸引着无数青年来这里感受体验当年革命先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延安成为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寻根铸魂之地。

异彩纷呈的文化融合

陕西是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的地区。陕西南北狭长，跨越了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三个气候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包括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和汉中平原。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圈。黄陵县以北，延安、榆林等地区，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浓郁特色。关中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属于农耕文化影响深厚的地区。秦岭以南的安康、汉中等地则受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更接近南方。陕西各地人秉性和文化气质迥然有别。陕北人义气豪爽，陕南人聪慧伶俐，关中人质朴耿直。各地的民俗文化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陕北民歌信天游，热烈奔放，高亢激昂；关中秦腔气势恢弘，大气磅礴，酣畅淋漓；陕南民歌情感细腻，婉转清丽。陕北的安塞腰鼓、剪纸、道情、秧歌；关中的西安鼓乐，凤翔的木板年画，华阴老腔，合阳提线木偶，陕南商州的皮影戏等，都充分展现出各自地域的特色和文化魅力。

陕西是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充分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动乱，形成了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在斗争中融合的趋势。先后在陕西长安建都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此外还有赫连勃勃在榆林建立的大夏国政权。统万城遗址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唯一早期北方少数民族王国都城遗址，代表了陕北游牧文化的繁荣兴盛。

古代陕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陕西文化深受西域以及印度、中亚、西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都城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西域各国的商人，组成庞大的商业贸易驼队，带着各国的奇珍

曾国藩的“碎碎念”：“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 王学斌

同治二年（1862年），挟攻陷安庆余威，曾国荃兵临南京，欲图继续复制其从前动辄围城数月、熬垮敌军的辉煌。然而，作为六朝古都，金陵城墙坚实绵长、军队以数十万计，岂是手头仅有区区几万人的一个湘军将领想拿下的？本想独享一块肥肉，孰料竟是极其难啃之硬骨头，况且眼瞅着其他将领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别的战区搞得风生水起、席卷数省，枯坐石头城下的曾国荃又急又气又火又悔，不禁虚火乱窜，肝病犯了。

其实，一直关注九弟的曾国藩心中更急更气。早在攻取安庆后不久，曾国藩就劝九弟切莫急怀再立新功之意，当审时度势，顺其自然，“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然而因大胜遂过膨胀的曾国荃哪里听得进老哥的忠告，一句“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还军待寇，旷日持久，非利也”，便径直走了回去。

九弟不领情、不听话，做兄长的，只能信一封一封地写，道理一遍一遍地讲，苦口婆心，不惮其烦。一年多下来，细看这数十通家书，确也揭示了曾国荃的问题所在。

九弟如此急功近利，首要问题在于遭受挫折太少。曾国荃发迹于跟随四哥镇压太平军，经历非常简单，且始终得兄长庇佑关照，可谓顺风顺水，罕有波折。他没有当过京官，未见过他人白眼，未尝过宦海浮沉，未

体会世态炎凉；他更没有白手起家，不曾遇到士绅羞辱，不曾面临覆灭之灾，不曾慨叹绝处逢生。曾国荃感受的更多是风雨后观赏彩虹的惬意，而不是苦盼晴日的那种几近崩溃的煎熬。所以曾国藩委婉指出，“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敛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敛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借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不经历秋残冬寒，人不会真正成熟，对于此，曾国荃亦自认“处顺境时多，未尝处过逆境。反躬自想，亦可谓得天最厚矣”。一句话，曾国荃仍旧是一位缺乏基层深入磨炼的“高级干部”。

若结合个人性情，曾国荃之急功近利，多半与贪念密不可分。彼时湘军诸多将领之中，曾国荃之贪财，可谓遐迩闻名。从军之后，随着功绩不断累积，曾国荃的贪欲也与之骤增，单就攻克安庆城一役，他纵容士兵屠城掳掠，有的“一人得赤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手里握着这么多战利品，曾老九更加挥霍无度。据曾国藩女儿曾纪芬回忆：这位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贪财是为了置田地建豪宅，而其来源必与战事有关，是故发战争财则须贪功，攻城略地越多，金银财富越多。贪念盈脑，欲壑难填，曾国荃早已把老哥“争名逐利，则当谦退”的八字箴言抛于九霄云外。

仕途顺遂，欲念方炽，胶着于权与利，老九终将丧失敬畏之心，这恐怕是曾国藩最为担忧的。《论语》中有“君子三畏”的原则，曾国藩便以此教训兄弟。他先以自己作为反面案例，自认过往也是意气用事较多，偏于倔强一途。后来屡败屡战，曾在数度生死系于一线的煎熬和考验中对“三畏”产生了更有温度和深度的领会。他觉得要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比如“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毕竟“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不做出格张扬之事，不留口实与把柄。至于敬畏家族的训诫，曾建议“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对此说法，曾国荃心中尚有所触动，坦言“弟于末事方事之初，讲求尽人力，临事究仍未尝代天主张，不过性偏急切，仿如要一手遮天做法，此事赴功之大病也，近亦稍知自返矣”。

说到底，曾氏兄弟二人一个谨慎持守，一个急功近利，还是彼此格局不同。待到同治三年，已围城近两载的曾国荃颇显力不能支之势。替兄弟着想，也是立足大局，曾国藩请示朝廷调李鸿章驰援。但想到此事不免会

引来九弟的忌惮，曾国藩一连写了数封信，帮老弟分析利弊，言说请李鸿章助剿，无非分享了曾国荃独占金陵的功勋和美名，其实好处更多。他分析道，若干年后，后人凭吊这场战役中的群雄，“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亡于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怀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局势说得这般透彻，骑虎难下的曾国荃也只得答应，请李鸿章一道攻城。一年之后，李、曾合力攻陷南京，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格局小之徒眼光往往在紧目当下之事，而格局大之辈则常常考虑三年、五年甚至更为长远的规划。曾国藩这一步，走得可谓不动声色又谋算深远。

曾国藩给九弟讲过一个道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真正的海阔天空，当时内心的平和从容、波澜不惊，确是曾数十年人世浮沉之洞见。看到这句话时，曾国荃39岁，一个正汲汲于名利的中年人，或许是很难理解此中真意的。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园置三面仿古铜镜，其意：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

丁小文 铜笔画

文化经纬

